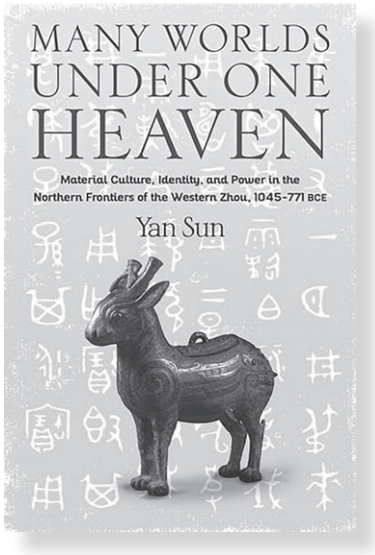
《漢學研究通訊》 0253-2875 第 41 卷第 1 期 頁 43-46

Many Worlds under One Heaven: Material Culture, Identity, and Power i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the Western Zhou, 1045-771 BCE



Yan Su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336 pages, ISBN 978-023-1198-42-4

歷史上沒有文字的人群如何發聲？這是本書的問題意識。書寫是權力的展現，不可避免帶有書寫者的主觀。以《詩經・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開山，形成了以西周統治者為主體的大一統史觀，其強調周王對於四土的政治控制，也側重周文化對於四方人群的同化。在這一個根深柢固的史觀影響之下，即使是日益豐富的考古材料往往只是用來「以物注史」，作為文獻史觀的佐證。不同於過往的研究，本書的思維可謂「由物見人」，以物質文化材料呈現西周王朝北疆多樣的文化與族群面貌，並藉此觀察不同人群在其中的因應與選擇之道。本書將邊疆界定為政治控制的邊陲與文化的接觸地帶，並指出北疆是以商、周王朝為代表的中原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的接觸前沿，多種政治勢力與文化在此交會，使其成為周王朝最為動態的空間，故以之為研究對象。

本書的資料以物質文化為核心，輔以銘文以及傳世文獻。全書各章節均對墓地空間、墓葬形制、葬式、葬俗、墓主頭向，隨葬品中的銅器、陶器、玉器以及石器等的形制、風格與器物組合，以及聚落遺址的出土物等，進行了細膩的文化因素溯源與比較分析。文中雖亦涉及北疆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但因較少敘事性的內容，故主要用以辨明族屬、探尋政治與社會網絡，或以之為周人書寫文化的象徵。至於傳世文獻的記錄更為有限，主要為史事提供框架。

敘事文本的闕如，突顯出物質文化材料的重要性。本書的研究方法是以物質文化作為人群表達身分認同與協調權力的語言。具體而言，不同於大一統史觀中的邊疆是由一群靜默而被動的人群所構成，本書基於人類學、社會學的身分構建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強調北疆紛繁的人群，無論是不同族群之間或是單一族群內部不同的性別、階層或個人，均展現出自覺地運用物質文化以建構身分、協調權力的能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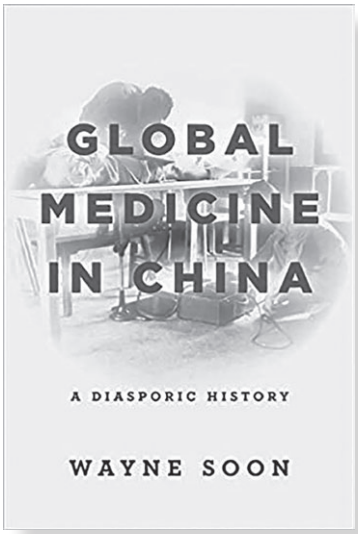
全書除前言與結論共分五章，大致依時間順序探討周王朝北疆的五個單元：第一章探討先周時期已為周人西北疆的涇水上游地區，尤其著重于家灣、白草坡、姚河塬、九站四個遺址，由商、周之際以至於西周中期玁狁興起之後的興衰過程。第二章探討汧河以至汧、渭之交的河谷平原地帶，並探討強 、夨、石鼓山三個政體的族屬、人口遷移、政治發展及其文化選擇和妥協的過程。第三章探討周人克商之後在汾、涑河流域的臨汾、運城盆地所構築的正北邊疆。該地的晉、倗、霸三國長期維持穩定關係，但在物質文化的選擇上卻有所不同，體現出不同族群對於身分認同的差異性。第四章探討西周早期以京津唐平原、遼西大凌河流域以及燕山山脈所構成的周王朝東北疆，著重呈現西周早期燕都琉璃河遺址的人口構成、政治參與及其向大凌河流域的擴張過程，又呈現了西周中期以後，燕國與周邊的張家園、魏營子以

及燕山山脈文化的消長關係。第五章探討西周中期以降在渭河上游與西漢水谷地形成最遙遠的西疆，呈現出寺窪文化與非寺窪文化共存的動態關係，並且探討西周中後期秦文化在眾多文化之中異軍突起的過程。

本書總結，依照政治與文化的穩定性，西周王朝的北疆可以區別為：（一）局勢穩定的「內疆」——汾水下游與西寶雞地區；（二）衝突前線的「外疆」——涇水上游；以及（三）周人試圖開拓的邊疆——西漢水與渭河上游地區。隨著周王朝與北方文化的消長，北疆游移於上述三種模式之間，展現出多變的政治與文化面貌。身處北疆的人群也體現出文化接觸的四種模式：（一）文化融合；（二）文化交雜；（三）文化體驗；以及（四）文化延續。多樣的文化接觸模式也進一步體現出在身分建構過程中，個人、性別、階層以及族群所扮演的多重角色。

綜上所述，本書不只對於考古材料進行了完整的收集，更展現出作者對於物質材料的細膩分析。在方法論層面上，「以物見人」的方法為西周不同時段與區域的歷史動態提供微觀視角，更呈現出大一統王朝內部尚有紛繁而多樣的世界，彼此的接觸與交流並非「同化」一詞所能概括，而是具有多種影響因素與互動模式。這些認識對於深受大一統史觀影響的中國歷史與考古學界自有啟發意義，對於世界史的帝國邊疆研究亦有比較研究之價值。（雷晉豪，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Global Medicine in China: A Diasporic History



Wayne So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312 pages, ISBN 978-150-3614-01-7

本書作者孫世倫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博士，現為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助理教授。本書以海外華人為主體，以時間序列為線索，自 1911 年晚清鼠疫的爆發至二戰前後生物醫學的引入與重建，展現出不同社會環境下中國生物醫學由流散走向相對聚集的發展態勢，利用來自三大洲的豐富檔案討論海外華人對 20 世紀中國醫學的塑造和對現代中國生物醫學發展之重要性。本書開篇以延安為例，具體描述了戰時中國軍隊嚴重的醫療困境，顯示出醫療救助需要空前迫切。而散居海外的華僑精英利用自身的人際網路與教育背景，為醫學實踐獲取資金支持、物資救助以及專業醫療理論和技術，同時基於戰時空間特徵將現代生物醫學進行調整與改造，對於戰時救助乃至中國生物醫學的長足發展具有難以言喻的關鍵作用。

本書除導言和結語外共分五章。第一章透過伍連德、林文慶、林可勝等三位早期指導者的醫學實踐為主題，追溯了海外華人醫師在中國生物醫學發展的國際策略。這些活動在戰前中國促進了生物醫學組織的聯合、醫學實踐的多樣化，以及科學研討會的召開和醫學生的培養。面對國內外二戰形勢的不斷加劇，精英主義的實驗室醫學不再適合具體的戰時需要，引起第二章生物醫學的軍事化轉變。本章通過詳述位於中國西南的紅十字